

仰韶时代彩陶的量化研究*

张鹏程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 西安市 710054)

关键词:仰韶时代 彩陶 比例

摘要:本文以汾渭盆地及其周边区域为中心,尝试统计仰韶时代各时期的彩陶比例。我国彩陶老官台文化,白家遗址 34% 的陶器为彩陶,半坡文化时期渭河流域继承了之前的彩陶传统,早期彩陶占比约 1%,晚期占比约 10%。庙底沟文化阶段彩陶占比在 4~8% 之间,中值为 6.7%。仰韶晚期时关中及陕晋豫交界地带的彩陶消失,而周边秦王寨、大司空、马家窑、屈家岭等文化的彩陶得以延续和发展,并缓慢消亡。彩陶的比例也受到聚落层级、聚落中心与边缘、聚落内的功能分区等方面的影响,这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KEY WORDS:Yangshao era Polychrome ceramics Percentage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statistically study the chronological change of the percentage of polychrome ceramics in pottery assemblages from sites in the Feng-Wei Basin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during the Yangshao er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Laoguantai Culture, 34% of ceramics from the Baijia site were polychrome. 1% of ceramics in the assemblage is polychrome during the Early phase of Banpo period, while the percentage jumps to 10% during the Late Phase. The percentage of polychrome during the Miaodigou period ranges between 4 and 8% with an average of 6.7%. During the Late phase of the Yangshao era, the tradition of polychrome ceramics gradually faded away in Guanzhong and the intercourse of the Shaanxi, Shanxi, and Henan provinces. In contrast, the polychrome tradition continued to exist, prosper in its surrounding neighborhoods like the Qinwangzhai, Dasikong, Majiayao, and Qujialing Cultures. Factors impacting on the percentage of polychrome ceramics include the hierarchy of settlements, core-periphery difference between settlements, and intern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ir function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all these issues are worthwhile more in-depth investigation.

“仰韶时代,是以老官台文化转变成半坡文化及与其相当的时期为起点,终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及与其相当的时期”^[1],在这一跨度长达 2000 年时期内,在黄河中游的汾渭盆地及其周边区域先后经历了半坡、史家/东庄、庙底沟、仰韶晚期诸文化这样一个演变的历程,这一演变最终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后来的文明生发均基于此。“仰韶”一词经过近百年的发现和研究,已经超出学术术语的范畴,成为一个尽人皆知的词汇。提到“仰韶”,最直观的有两个映像,一是红陶,一是彩陶,尤其彩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仰韶”的象征,但是提到彩陶,却有一些基本的问题还没有进行说清,问题之一就是:彩陶到底有多少?李济和梁思永在西阴村发掘中试图量化的回答这个问题,李济列举了第四探方中四个层位的纹饰比例^[2],统计数据分别为:3.52%

、2.08%、7.8%、5.71%。而梁思永公布了第四探方的全部统计数据^[3],他统合所有数据,在 18728 片陶片中有 1356 片彩陶,得出了彩陶占比 7.2%。但是由于当时发掘方法的局限,将不同时期的彩陶混合起来,导致其统计口径有误,降低了统计数据可信度。在此后多年的考古学实践中,发掘以及资料整理中的统计方法问题一直没有完全解决,以致今日我们都未能解决彩陶的占比的问题。

1959 年公布的庙底沟遗址发掘报告^[4],统计了庙底沟遗址 4 个灰坑的 16802 件标本和三里桥遗址 H6 的 487 件标本,得出彩陶占比为 14.02% 和 2.47%。1983 年公布的元君庙墓地报告^[5]统计了元君庙墓地随葬品的彩陶比例为 1.4%。西阴村、庙底沟、元君庙所进行的统计并未形成学术传统,这种量化的努力在很长时间里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渭河流域全新世农业活动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批准号 41471167)资助。

都属于凤毛麟角,大多的考古报告和简报中对彩陶的比例或不谈、或使用“一定”、“少量”等描述性词语,即使提供统计数据,也往往是“个别”“典型单位”。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库,庙底沟和元君庙所提供的数据也在很长的时期内被默认。严文明在1978年讨论甘肃彩陶的时候说半坡期彩陶占整个陶器中的比例约2~3%,庙底沟期通常占陶器总数的10~15%^[6],这代表了学界的一般认识。1996年出版的《河南史前彩陶》^[8]试图在更长时段给出答案,但是由于基础数据的缺乏,书中谈到第一阶段(半坡时期)1%,第二阶段的庙底沟遗址14%,第三阶段彩陶空前增长,第四阶段有少量彩陶,白衣彩陶消失。在举了少量统计数据之外,书中主要使用的还是较少、少量、空前增加等描述性词语。这种混沌的认识阻碍了我们对于彩陶的深入认识和研究,有必要进行梳理并提出解决的方法,本文即对此做一点尝试。

一、老官台文化阶段的彩陶

老官台文化或称白家文化,是汾渭盆地彩陶的肇始期。该时期的遗址有白家村、元君庙、关桃园、大地湾、西山坪、垣曲古城东关、翼城枣园等,墓葬有大地湾等。因部分统计数据并未基于分期,故这里的讨论也不涉及分期问题。遗址中,渭河流域中以白家村遗址的面积最大,堆积最为丰厚,报告中^[9]说“彩陶占陶器总数的34%。……可以说,白家村遗址的红褐陶就是彩陶。”元君庙遗址H4069的统计中彩陶占2.2%。大地湾遗址一期分为两段进行统计,将之合并后彩陶有41件,占全部220件标本的18.4%;在遗物介绍中举了完整和可复原器214件,其中有彩陶55件,占比25.7%。翼城枣园提供了三期22个单位的统计数据,总计584件标本,其中彩陶有139件,占23.8%。西山坪遗址的该阶段遗存仅提到有少量彩陶。垣曲古城东关一期^[10]的统计样本量较大,彩陶占1.8%。宝鸡关桃园^[11]和陇县原子头^[12]的该阶段遗存中无一例彩陶。

大地湾一期有墓葬15座,出土陶器35件,就发表情况统计,有11件彩陶,占比31.4%。

从以上的情况白家村和大地湾一期、翼城枣园,不论是遗址还是墓地彩陶比例都比较高,尤其白家村达到陶器总数的34%。老官台2.2%、古城东关一期1.8%、西山坪少量彩陶,以及关

桃园、原子头无一件彩陶的情况^[13],则可能与聚落等级有关,尤其将其与白家村、大地湾相比较而言,这种聚落等级差异的可能性很高。

二、半坡文化阶段的彩陶

半坡文化可分为半坡和史家、东庄这三个类型,代表了早晚两期。在现有的材料中,或不统计,或不基于分期进行统计,或基于错误的分期进行统计,可用的数据有限。

半坡文化早期遗址的统计材料仅华县梓里H25^[14]的数据,该单位出土陶片2464块,其中彩陶占0.31%。半坡文化晚期的遗址材料较多。大地湾二期^[15]统计了13个单位的房址和灰坑,共1313件标本,其中彩陶占18.59%。西山坪^[16]二期统计了T1⑥的460件标本,其中彩陶占13.3%。原子头^[17]二期统计了4座房址的1247件标本,其中彩陶占3.77%,原子头三期统计了4座房址和2座灰坑的2882件标本,其中彩陶占19.33%。白水南山岗^[18]G2统计了5735件标本,该单位为东庄类型第二期,彩陶占18.2%。东庄村^[19]统计了H104的1879件标本,其中彩陶占25.87%。三里桥^[20]H6统计了487件标本,彩陶2.47%。南交口^[21]一期统计了12个地层和灰坑单位的7210件标本,其中彩陶占1.08%。古城东关二期^[22]统计了6个单位共4658件标本,其中彩陶占4%(仅有彩顶钵)。北墩^[23]一二期统计了3个灰坑的2085件标本,其中彩陶占9.59%。

半坡文化早期的墓葬材料较少。元君庙^[24]有57座土坑墓,出土290件陶器,其中4件彩陶,发表盆、罐、钵各一,占比1.4%。鱼化寨有12座土坑墓^[25]和96座瓮棺葬^[26],12座土坑墓出土陶器37件,无一彩陶;96座瓮棺葬共出陶器199件,其中彩陶4件,均为盆,占比2%。姜寨^[27]一期共有380座墓葬,其中174座土坑墓出土陶器588件,206座瓮棺葬出土陶器387件,共发表彩陶9件,其中土坑墓3件,瓮棺葬6件,有6件彩陶盆,3件彩陶钵,土坑墓彩陶占比0.5%,瓮棺葬彩陶占1.5%。何家湾^[28]有墓葬9座,出土21件器物,其中1件彩陶壶,占比4.7%。

表一 半坡文化各墓地的陶器组合

	遗址	钵	罐	尖底瓶	葫芦瓶	盆	壶	瓮	彩陶
早期	鱼化寨	15	11	4			4		-
	元君庙	149	92	40		4	4		1.4%
	姜寨土	160	141	43			12		0.5%
	姜寨瓮	150	36	1		27		170	1.5%
晚期	王家阴洼	88	89		23	15	11		30%
	史家	30	63	2	35	8	3	-	
	大地湾	36	26		5	3	4	6	31.8%
	鱼化寨瓮	81	40	7		10		58	20.4%

龙岗寺^[29]的统计未区分半坡和史家,彩陶占5.9%。北首岭^[30]虽出土墓葬较多但未发表统计数据。

半坡文化晚期的墓葬材料较多。姜寨^[31]二期有294座墓葬,其中土坑墓191座,瓮棺葬103座,共出土197件葬具,共发表盆、葫芦瓶、尖底缸、钵、细颈壶5类彩陶26件^[32],其中土坑墓23件,瓮棺葬3件,整体占比13.2%。史家^[33]遗址发掘了43座墓,出土陶器144件,无一彩陶。合阳吴家营^[34]共有5座墓葬,3座有随葬品,出土陶器13件,其中彩陶7件,占54%。鱼化寨^[35]有26座瓮棺葬,出土陶器49件,其中彩陶10件,盆2件,钵8件,彩陶占比20.4%。大地湾二期有21座墓葬,出土陶器85件,发表彩陶27件,占31.8%。王家阴洼^[36]有63座墓葬,出土陶器233件,发表227件^[37]，“彩陶约占陶器的三分之一”，发表墓地出土彩陶中有细颈壶3件、盆4件、钵7件。何家湾^[38]墓地有7座墓葬,出土10件陶器,无一彩陶。龙岗寺^[39]半坡阶段墓地共423座墓葬,242座有随葬品,共出土陶器1254件,报告提供了一个未分期的彩陶统计数据:5.9%。

遗址方面,房址和灰坑、地层之间的统计差异不明显,半坡文化早期阶段的统计数据太少,半坡文化晚期阶段的样本量较大,彩陶比例也高一些。从统计的样本量来看,南山岭、东庄村的单位标本量很大,而大地湾的单位标本量很小,不过从这组数据的总体标本量来看,达到了27956件标本,其中彩陶总计2708件,占9.69%。由于报告编写者在选择材料时往往要选取典型

单位来进行统计,这种人工干预本身就导致了统计数据的失真,故该时期的遗址中彩陶所占的比例可能会低于这一数值。

墓地方面,将属半坡文化早期的元君庙、鱼化寨、何家村和姜寨一期的数据整合后得到1.18%的彩陶比例,其中土坑墓彩陶占比0.85%、瓮棺葬彩陶占1.7%。可见半坡类型阶段

墓葬中的彩陶很少,土坑墓尤其少,瓮棺葬略多。从器类来看,主要为盆和钵,尤其是宽彩带钵占主。将半坡文化晚期阶段的数据整合后有总计1985件标本,其中彩陶214件,占10.8%。由于姜寨和龙岗寺的统计数据有缺陷,故这两项数据都低于实际彩陶比例,而这两个遗址是样本量最大的,故笔者估计该期墓葬的彩陶比例当在15%以上。估算这一时期整体的彩陶比例也可能是无意义的,因为各个遗址之间存在种种的差异,如史家和何家村这两个墓地就无一彩陶,而大地湾和王家阴洼这两个有统计效应的墓地彩陶都占到三分之一,这种差别不应是偶然的。史家遗址虽然器类和器型与同期的其它遗址基本一致,但是在葬俗和盆、钵、碗、罐等器物的具体形态上又与其他遗址有些差异,其未发现彩陶的原因,也可能与人群的流动与融合有关,当然也不能排除是聚落等级的差异,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全面的统计和更多的研究。

我们将早晚两期墓葬的器物组合及数量制成表一,其中碗归入钵,平底瓶归入尖底瓶,缸归入瓮,盂、器盖、方杯等数量较少且偶尔一见的予以忽略。从表一可见,早晚两期器物组合的主要变化是随葬尖底瓶转为随葬葫芦瓶,此外器类和器类间的比例基本上得到了延续,各遗址间彩陶比例的差异是同一文化、同一器物群中的差异。早期的墓地中彩陶的占比都很低,而且器类主要为盆和钵。晚期的墓地和遗址彩陶比例都增高了,关中及其以西的遗址彩陶比例较高且器类丰富一些,东部的古城东关、北撤、南交口比例依然很低,而且器类单一,几乎全是宽彩带钵。晚期

表二^[56] 庙底沟文化彩陶统计一览

遗址	彩陶	总数	百分比
庙底沟	2254	16082	14.02
案板	1078	34479	3.1
泉护村 2	10494	148952	7.045
白水 G9	185	3236	5.72
李家河	99	1670	5.93
白水 2010	1698	30784	5.52
原子头	110	1504	6.72
福临堡	99	3169	3.12
西山坪	26	315	8.2
大地湾			18.7
固镇	454	2666	17.4
耿壁	93	688	13.5
西阴村 1	1356	18728	7.2
西阴村 2	84	491	17
西坡 H22			10
西坡 H116			6.27
槐林 H8			4
南交口	1223	19140	6.39
古城东关	53	2953	1.8
北橄	86	1401	6.14
王湾			6.15

时渭河流域的彩陶有钵、盆、葫芦瓶、细颈壶、尖底缸、尖底瓶、罐等,彩陶的种类不再局限于盆和钵,纹饰也非常多样,与东部简单的彩陶纹饰形成鲜明对比。从白家开始的彩陶传统表明彩陶兴盛的中心区域是渭水流域,该区域从很早开始就有使用彩陶的传统,这一彩陶传统在半坡文化晚期得到大发展。

三、庙底沟文化的彩陶比例

在半坡文化晚期时,东庄类型开始向北向东大肆扩张,随后在黄河中下游出现了成熟而强势的庙底沟文化,经由庙底沟文化,今日北中国范围内的古代文化发生了第一次大范围的整合,奠定了此后古代文明生发的基础。该时期的统计数据,有庙底沟的 4 个灰坑、案板^[40]的 18 个灰

坑、南交口^[41]二期的 21 个灰坑、古城东关^[42]的 5 座灰坑和 1 座房址、西山坪^[43]的一个地层、大地湾^[44]的 9 座灰坑和 1 座房址、原子头^[45]四期的 4 座灰坑、白水(下河遗址 2010 年发掘的 2 座房址和 20 个地层及 34 个灰坑、下河 G9、李家河 1 座房址 3 个灰坑)^[46]、王湾^[47]一期的 4 个灰坑、福临堡^[48]一期的 1 座房址、泉护村 2 次发掘^[49]的 2 座房址和 121 座灰坑、河津固镇^[50]的 2 座灰坑、山西洪洞耿壁^[51]的 2 个地层、山西西阴村一次发掘的整合数据和二次发掘^[52]3 座灰坑、灵宝市西坡 2001^[53]发掘的 H116 和试掘^[54]H22、新安县槐林^[55]的 H8 遗址等,这些遗址的数据除白水、泉护村二次发掘外均已公布。将以上所列数据制成表二。

表二中庙底沟、案板、泉护村二次发掘、白水 2010 年发掘、西阴村一次发掘和南交口的样本量较大,小样本量中除固镇和耿壁较高、福临堡较低外基本位于 5~8% 之间,将全部标本整合后得到总标本 286258 中有彩陶 19383 件,占比 6.77%。

这批数据中需要注意的是案板和福临堡,这两个遗址的样本量并不小,相距也不远,但是彩陶比例严重偏低。福临堡的数据较少,但案板数据较多,可以作进一步分析。案板一期的统计数据分为沟南中区(GNZ)和沟南东区(GND),这两区域的地形有异。案板遗址南北两侧临沟,西北方向与黄土塬相接,地貌西北高东南低,壕沟将南北两侧的自然沟壑连接器类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貌,在遗址的最高处是一个高出周围约 4 米,面积约 3.7 万平方米的台地,沟南中区即为此处,案板的大房址 F3 就位于这一台地的最高处。而沟南东区则位于这一台地向东南延伸的坡地上。两相比较可知沟南中区为遗址的中心区而沟南东区为遗址的边缘区,沟南东区统计了 8 个单位,每单位陶片 1606 件;沟南中区统计了 10 个单位,每单位陶片 2162 片,可知堆积丰富程度的差异,两区域的彩陶比例差别也很大,沟南东区仅 1.33%,而沟南中区达 4.19%。这种差异同样体现在案板遗址二期,二期中沟南东区彩陶为 0.03%,沟南中区为 0.13%,二期时彩陶已经消失,所统计的彩陶是早期遗物混入晚期单位而来,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遗址的区域

差别。即使考虑到聚落内部的差异,案板遗址和福临堡遗址的彩陶比例仍远低于同期的其它遗址,这种差异可能也要归结到聚落群中的等级差异或区域差别。

白水下河也是一个可以进行聚落内分析的遗址。下河遗址的 F1、F2 两座超大型房址所统计的彩陶比例为 6.04%,20 个地层的比例为 5.52%,33 个灰坑的比例为 4.48%。这一比例差异,似乎表明在房址周边的彩陶比例会高于一般灰坑。但是下河的两座大型房址较为特殊,其周边无同期单位,均为大型房址废弃后形成的,不能反映居住/使用与废弃之间的差异。大型房址 F1 的墙体及其倒塌堆积中夹杂有大量多破碎度很高的陶片,在这类堆积中的彩陶比例达到 8.34%,这可能表明在大型房址建筑或使用时的彩陶比例,也可能这些破碎度高的陶片是有选择的进行破碎和掺入墙体中的。下河 G9 位于壕沟以外,可能是一条聚落外部的道路,其彩陶占比达 5.72%,但其中约三分之一为东庄类型的遗物,故归属庙底沟时期的彩陶比例当低于这一数值,同时也低于遗址中心区两座大型房址周边的统计值。

总的来说,庙底沟阶段的彩陶比例约为 4~8 之间,中值为 6.7%。该时期房址、灰坑、沟等遗迹中的彩陶比例并未见到明显的差异,但是在遗址的中心一边缘关系上观察到堆积丰富程度的差别与彩陶比例的差别。

三、仰韶晚期及以后的彩陶比例

关中地区在进入仰韶晚期以后,文化上以西安左近为界分裂为西王村和半坡四期两个文化,彩陶基本上消失了,所发现的彩陶或归属于秦王寨文化、或归属于屈家岭文化、或归属于大地湾四期文化。灵宝西坡的大型房址 F102 和 F105 废弃并被 H116 打破,与 H116 同期的单位还有 2000 年试掘的 H20,西坡墓葬的起始不早于这两个单位,西坡大型房址的废弃和墓地的出现表明该时期出现了剧烈的社会变迁,彩陶消失的进程与文化裂变的进程都始于此时。该时期的遗存首先在福临堡遗址被识别出来,以 H37 为代表,称为福临堡二期,被看作是一个过渡时期⁵⁷。

该阶段的陶器非常接近仰韶晚期,福临堡遗址统计了 5 个灰坑的 6797 件标本,彩陶占 0.09%,从发表的 5 件彩陶标本来看,4 件归属于大地湾四期文化,1 件归属于秦王寨文化。同属该时期的原子头遗址五期统计了 3 个灰坑的 1875 件标本,无一件彩陶。这一时期庙底沟文化的大型房址消失了,彩陶消失了,文化裂变了,应当将之看作庙底沟与仰韶晚期的分水岭,将西坡 H116 打破 F102/F105 看作一个标志性事件,将与西坡 H116、H20 同期的遗存均划入仰韶晚期。

仰韶晚期的汾渭盆地及其周边区域产生分化,东部有秦王寨文化,西部有大地湾四期文化,北部有海生不浪一义井一大司空一系的文化,南部有屈家岭文化。处于中心的关中及陕晋豫交界地带分布着西王村和半坡四期文化,这一文化中传承自庙底沟文化的彩陶消失了,偶见的彩陶多为宽沿盆的沿面上所绘的几何图案,此外的彩陶多为周边区域输入。西安米家崖遗址发表仰韶晚期灰坑 98 个、地层 3 个,其中彩陶总计 11 片,10 片为宽沿盆的沿面所绘的几何图形,从统计来说,在数万片标本中的这几片彩陶可以忽略不计。蓝田新街遗址有仰韶晚期的 245 座灰坑和 3 座房址,出土彩陶 20 余片,其比例与米家崖类似。此外西王村^[58]彩陶仅四片,河津固镇和三门峡南交口无一片彩陶。东部的古城东关遗址四期彩陶占 1%,王湾二期^[59]彩陶 1.5~2.7%。关中西部的原子头六期彩陶占 4.58%,福临堡三期彩陶占 1.01%,这两个遗址所见的彩陶与大地湾四期文化相同。关中以西的大地湾遗址四期是其最兴盛的时期,报告中发表彩陶 14 件,占发表器物的 2.3%;报告中发表了 6 个灰坑和 3 座房址的统计数据,总计 2188 件标本中彩陶占 1.4%^[60]。与之类似的数据还有甘肃宁县阳孤遗址^[61],彩陶占 2% 左右。但是师赵村四期的 3 个地层统计了 284 件标本,其中彩陶占 26.4%,西山坪五期彩陶占 6.3%,这两个数据有明显偏高。

在周边区域中,严文明曾对大司空^[62]文化的彩陶进行了梳理,其中界段营 5%、下潘旺 24%、大正集老墨岗 9%、大寒南岗 18.4%、鲍家唐 6%,这几个数据样本量不大,比例差异较大,难以得出一般性结论。从郑州大河村^[63]可以看

出彩陶在东部的演变情况,大河村前三期中无彩陶,大河村前二期中彩陶占 1.09%,大河村前一期中彩陶占 1.43%,大河村仰韶一期中彩陶占 4.63%,大河村仰韶二期中彩陶占 2.78%,大河村仰韶三期中彩陶占 2.11%,大河村仰韶四期中彩陶占 2.69%,此后彩陶消失。从大河村来看,东部的彩陶一直不多,在庙底沟文化时达到 4.63% 的峰值,但是其后一直稳定在 2% 以上直至王湾三期时才消失。关中以西区域在大地湾四期文化时与关中的文化发展开始不同步,此后逐渐自成系统转变成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彩陶非常发达,以青海柳湾遗址半山期^[64]为例,彩陶占到墓地随葬陶器总数的三分之二。在马家窑文化的系统中彩陶一直延续至青铜时代并向西进入了新疆东部,兹不赘述。

总的来说,仰韶晚期时东部的彩陶比例约在 1~2%; 关中及陕晋豫交界地带或不见彩陶或占比极少,估计占比小于 0.01%; 西部的大地湾四期文化则占比在 1~3% 之间。从仰韶晚期开始,各地的文化开始了一个区域化的过程,产生了各种地方文化,形成了不同的彩陶文化。

四、结语

我国的彩陶起源于老官台文化,在白家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彩陶,占到陶器总数的 34%。在半坡文化早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彩陶的数量都比较少,约 1% 左右。到半坡文化晚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彩陶的比例大幅上升至 10% 左右,彩陶数量的上升也伴随着彩陶器类和彩陶纹饰的多样,可以说该时期是彩陶发展上最重要的一段时间。随着半坡文化晚期东庄类型的大肆扩张,庙底沟文化在很广大的空间内进行了第一次文化整合,达到了仰韶时代社会发展的顶峰,该时期目前的考古发现主要为遗址,其中的彩陶占比在 4~8% 之间,中值为 6.7%。庙底沟文化崩溃后进入了仰韶晚期,该时期各地发展了诸多的地域文化,这种趋势延续了近千年,该时期关中及陕晋豫交界地带的彩陶传统中断,彩陶突然消失了,而周边的秦王寨文化、海生不浪—义井—大司空—一系文化、大地湾四期—马家窑—一系文化、屈家岭文化都继续保留有彩陶,尤其在西部的马

家窑文化系统内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从长时段和大的空间范围内来观察,彩陶的多寡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但是在聚落群和聚落内部的层面上,彩陶的比例差异还比较复杂,中心聚落与一般聚落、聚落中心和聚落边缘、聚落中不同类型的功能单位等方面均有一些具体的差异,这些差异需要更多的系统统计和细致研究来揭示。当前的现状是不统计、挑选部分单位统计、统计口径差异、报告中的统计数据相互矛盾,这些问题制约着资料的汇总分析,如果都能开展系统统计,那么开展基于数据分析的数字考古。

蒙王炜林老师和翟霖林先生提供泉护村二次发掘及鱼化寨遗址的统计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
- [1] 张忠培. 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J]. 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1).
 - [2] 李济. 西阴村史前的遗存[C] // 三晋考古(2).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 [3] 梁思永. 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陶器[C] // 三晋考古(2).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 [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庙底沟与三里桥[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 [5]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 元君庙仰韶墓地[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 [6] 严文明. 甘肃彩陶的源流[J] 文物. 1978(10).
 - [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史前彩陶[M]. 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6:9.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临潼白家村[M]. 成都:巴蜀书社,1994:85.
 - [9] 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 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J]. 考古学报,1980(3).
 - [10]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垣曲古城东关[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 [1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宝鸡关桃园[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 [12]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陇县原子头[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 [13] 这一情况也可能是源于统计时的对彩陶的认识差异,主要涉及顶部抹光的“红顶钵”。
 - [14] 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 77 级华县梓里实习队. 陕西华县梓里遗址发掘纪要[J]. 文物,2010(10).
 - [1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秦安大地湾[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师赵村与西山坪[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 [17] 同[12].
- [18] 白水县南山崩遗址资料现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 [1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J]. 考古学报, 1973(1).
- [20] 同[4].
- [2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门峡南交口[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 [22]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垣曲古城东关[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2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翼城北橄遗址发掘报告[J]. 文物季刊, 1993(4).
- [24] 同[5].
- [25]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西安鱼化寨遗址仰韶文化土坑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11(6).
- [26]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西安鱼化寨遗址仰韶文化瓮棺葬墓发掘简报[J]. 文博, 2012(1).
- [27] 半坡博物馆,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 [2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西乡何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首次发掘[J]. 考古与文物, 1981(4).
- [2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龙岗寺[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宝鸡北首岭[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
- [31] 半坡博物馆,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 [32] 姜寨遗址未发表统计数据, 故本文使用报告介绍的器物数量和发表的彩陶进行统计, 因宽彩带钵这类器物较为多见, 故发表数量应远远少于实际数量, 这一情况导致本文的统计结果低于实际比例。
- [33] 西安半坡博物馆, 渭南县博物馆. 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时代遗址[J]. 考古, 1978(1).
- [3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合阳吴家营仰韶文化遗址清理简报[J]. 考古与文物, 1990(6).
- [35] 同[26].
- [36] 甘肃省博物馆. 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发掘[J]. 考古与文物, 1984(2).
- [37] 因遗址中所出极少, 且就已发表材料无法将之排除, 故忽略不计。
- [38] 同[28].
- [39] 龙岗寺纹饰统计总计 1491, 器型统计总计 1254, 正文介绍总计 1241, 器物分类计数合计 1233。但是龙岗寺未基于分期统计, 考虑到晚期的彩陶数量多于早期, 故将这一统计数据纳入晚期进行计算, 但这一数据应比真实比例低一些。
- [40]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 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41] 同[21].
- [42] 同[22].
- [43] 同[16].
- [44] 同[15].
- [45] 同[12].
- [46] 白水县几个遗址的发掘资料, 现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 [47]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洛阳王湾[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48]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宝鸡福临堡[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3.
- [49] 泉护村遗址第 2 次发掘资料, 现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 [5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河津固镇遗址发掘报告[C]//三晋考古(2).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 63-126.
- [5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洪洞耿壁遗址调查、试掘报告[C]//三晋考古(2).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 127-140.
- [5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阴村史前遗存第二次发掘[C]//三晋考古(2).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 1-62.
- [5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 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 2001 年春发掘简报[J]. 华夏考古, 2002(2).
- [54]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试掘简报[J]. 考古, 2001(11).
- [5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新安县槐林遗址仰韶文化陶窑的清理[J]. 考古, 2002(5).
- [56] 表中部分遗址未提供样本量. 大地湾因报告表格错误而无样本量. 王湾一期统计了 4 个单位, 彩陶比例分别为 1.6%、3%、5%、15%, 简单平均为 6.15%。
- [5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宝鸡福临堡[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3.
- [5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J]. 考古学报, 1973(1).
- [59] 王湾报告 15-17 页称属 2、3、4 段属二期, 2 段彩陶 20% 左右, 3 段彩陶 10% 左右, 4 段少量彩陶, 这与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相矛盾。
- [60] 大地湾报告中说, 约三分之一的遗迹单位无彩陶, 出土彩陶的单位最高者可达 3~5%, 一般在 3% 以下, “考虑到统计时则可能将彩陶器的未饰彩残片计算到素面陶中, 因此实际彩陶比例要高于统计数字. 总体估计本期彩陶比例不超过 5%。”
- [61] 庆阳地区博物馆. 甘肃省宁县阳孤遗址试掘简报[J]. 考古, 1983(10).
- [62] 严文明. 大司空类型彩陶之分析[C]//考古学研究(八).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 [63]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大河村(上)[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64]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青海柳湾[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责任编辑 杨岐黄)